

丰禾
◎
著

文化信念與制度

川西北的變遷

CHUANXIBEI DE BIANQIAN
WENHUA XINNIAN YU ZHIDU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丰禾
◎ 著

文化信念與制度

——川西北的變遷——

CHUANXIBEI DE BIANQIAN
WENHUA XINNIAN YU ZHIDU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信念、与制度：川西北的变迁 / 丰禾著. —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09-5018-7

I. ①文… II. ①丰… III. 藏族—民族地区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四川省②藏族—民族地区—社会发
展—研究—四川省 IV. ①F127.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1941 号

WENHUA XINNIAN YU ZHIDU
CHUANXIBEI DE BIANQIAN

文化、信念与制度：川西北的变迁

丰禾 著

责任编辑	李卫红
封面设计	李 敏
责任印制	李 蓓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制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2.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5018-7
定 价	98.00 元

著作权所有·侵权必究

制度扩散中的政治推行与差异性（代序）

刘世定

丰禾在其著作《文化、信念与制度：川西北的变迁》出版之际，嘱我作序。阅读下来，引发一些理论思考，记录下来以为代序。

1. 社会演化的差异性问题的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演化的差异性是一个令历史理论家感兴趣的问题。不过，立足于不同的现实和具有的相应眼界，人们对问题的提法却会不同。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演化始自同样的起点——采集、狩猎和原始的组织形态，那么何以在不同地方演化出差异很大的制度体系、社会形态和绩效特征^①？虽然历史理论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迅速把眼光投向上万年的时间跨度，但是若考虑此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一个伴随近代产业革命、航海技术发展、新大陆发现、世界市场形成而生的典型问题。因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在宗教、伦理、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异性才如此赫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于需要在科学上去寻求解释，而不是作为饭后茶余闲谈的奇闻逸事。

无疑，这个问题在当今时代仍不失其学术魅力。不过，世事变迁，总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刺激人们去思考。在今天这个某些制度（如市场经济制度、普选制度）通过政治力量强劲扩张并有覆盖全球之势的时代，在这些强劲扩张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引发不同的社会后果的时代，我们不能不加以严肃考虑的问题

^① 道格拉斯·C·诺思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8 页。

之一是：何以看似同样的制度安排，却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这里同样涉及差异性问题，但与诺思问题是在不同的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涉及的。

这个问题虽然在当今时代特别凸显，但并非只是在当代才面临；这个问题虽然在当代具有全球性，但并非在其他场合未曾出现。事实上，在丰禾这本著作所研究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之川西北社会变迁中，已经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就具体过程和情境而言，其中必有特殊之处，这是不言而喻的。

2.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间的关系

要解释上述问题，有必要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因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关系的不同，会导致由这两类制度综合而成的制度体系的运行状态不同，并常常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

从这两类制度有同有异的角度着眼，我们既可能遇到非正式规范相同而正式制度不同的情况（例如，两个国家有相同的作为非正式规范的宗教规范，而正式的国家政治制度却不同），也可能遇到正式制度相同而非正式规范不同的情况。不过，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后者。上一节中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属于这种情况，丰禾在书中讲述的川西北变迁故事所涉及的也是这种情况。

显而易见，正式制度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掌握者的推行而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程度的同一性。但是，由于正式制度的界定和实施成本的存在，因此，任何正式制度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这给非正式规范作用的发挥以及人们在正式制度之外寻求利益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相容性在这里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二者相容，那么，非正式规范的存在不仅能够降低正式制度的界定、实施成本，而且能够弥补正式制度之不完全所可能引发的某些失序问题。当诺思强调非正式规范是正式制度基础的时候，主要关注的应该是这种状况^①。当某些法律社会学家^②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正式合约不完全时人际关系能够在其中发挥弥补作用时，关注的也是这种状况^③。有必要指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仍然可能存在因非正式规范的差异而产生的整个制度体系的差异性，不过，这种差异

^① 道格拉斯·C·诺思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49~73 页。

^② S. 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3 (28), pp55-69

^③ 道格拉斯·C·诺思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8 页。

性并不伴随着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冲突、摩擦。

如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存在着不相容性,那么,这时产生的差异性就伴随着摩擦。正式制度的运行就会因此付出较上述相容性条件下更高的代价,因为它需要克服由非正式规范引导和激励出来的、被正式制度视为越轨的行为。这种代价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的不相容程度正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存在紧张关系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都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支持其维持下去,任何一方都不会在短期内退出社会舞台,那么,两类制度之间就将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磨合、相互调整过程,人们在存在矛盾的制度间的适应也将经历一个过程。

从对于社会演化差异性的学术研究角度着眼,不论差异性的产生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的相容性相伴随,还是和不相容性伴随,都很有研究意义。然而,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着眼,伴随着制度摩擦的差异性通常更加受到关注,因为它引导出许多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现实问题。

制度的正式性和非正式性有时会相互转化。许多正式制度都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非正式性之后被逐步正式确立起来的。而某些正式制度,被革命性的变革废除了其正式地位,却可能转化为非正式制度而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作为政权组成部分的宗教的教义,具有正式制度特点。在政教合一制度被革除后,宗教教义不再借助政权力量被当作正式制度,但它在教徒中却仍然发挥着行为规范的作用。在川西北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转化。

正式制度的建立、实施和扩散离不开存在于人们心智结构中的观念体系的支撑,非正式规范的传承、演化更离不开观念体系。要理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的关系以及由此引致的制度运行后果的差异性,把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当事人的观念体系是非常关键的。希克斯在研究经济史理论时告诫经济学家,不要简单地以他们熟悉的提问方式——即“如果我处在那个地位我应该做些什么?”——来思考,而必须加上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是那种人。”^①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到特定历史条件的文化和观念体系中去。

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

3. 研究地的选择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确定研究主题后，研究地的选择是一件颇值得考究的事情。马克思曾谈到，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如有可能，便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而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需要选择当时资本主义得到更充分发展的国家进行研究，他选择了英国^①。撇开进入可能性、资料获取可能性等技术因素不谈，研究地的社会特征和拟研究主题的匹配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重要关系的凸显和研究的深入。

当代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们都意识到，变迁中的中国是一个研究社会变迁特别是制度变迁的绝好“实验室”。循类似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研究制度扩散中的政治推行和差异性，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而在这方面研究中，川西北地区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子实验室”。

在1950年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力量进入川西北地区进行制度变革之前，该地区的正式制度以及通行的非正式规范就和我国的北部、东部、南部、西北部地区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此后，不论是在1950年代的制度变革中，还是在19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中，该地区面对全国一体化的制度扩展，均表现出一些与上述其他地区颇有不同之处。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将该地区的变迁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制度一体化和差异性关系的认识。

以上所谈的是理论研究问题。丰禾的这部著作并非是一部专门谈理论的书，但是，我认为，书中对川西北社会变迁过程的阐述，将会引发我们作深入的理论思考。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

^① 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前言

五世达赖在《西藏王臣记》中记叙了朗达玛遇刺，西藏陷入了分裂状态后，发生了“民众叛乱”的这一历史事件，并说“叛乱事件最初是从康区发起的”。尽管书中没有详细说明这次叛乱起于康区何处何因，但结合近代以来的变乱，使人感到康区变乱似乎已有可考的先例，客观上也印证了“西藏未乱康巴先乱”的历史经验。相关研究表明，康区变乱确实不少。不究久远，仅考察晚清以降近百年沧桑，从迭起的历史事件，便可见康区的变乱实在不少于其他藏区，而康区的核心在川西北（本书的川西北即川西北藏区）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

一

较之其他区域，川西北似乎确有很大不同。首先受“认”而不“同”与“同”而不“认”的困扰纠结。藏族不是单一族源的延续，而是由青藏高原诸土著部族长期融合发展形成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个问题，有人从人类学角度做了研究，把康巴人头骨与西藏人头骨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西藏人具有“僧侣型”特征，而康巴人具有“武士型”特征，尽管这尚有争论，但是社会生活中康巴人与西藏人确有很多的不同^①。不论是宗教信仰的教派之间，还是语言环境和民风民俗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别。这与康藏各自的历史进程确有很大关系。历史上“诸羌”并立纷争，藏传佛教东渐加速了文化同一性进程，使包括康巴人在内的川西北居民逐步具备了与西藏居民共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比如以宗教为纽带的文字、语言和礼仪习俗等方面得到了快速的传播和认同，这也加速了族群间的包容和认同。但认同不等于同一，二者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历史上

^① 古瑟普·詹纳、杨元芳、陈忠祥：《西藏拉萨出土的古人类遗骸》，《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

“认”而不“同”的情况是存在过的，现实中“认”而不“同”或“同”而不“认”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不论近代“梁如逐藏”，还是藏兵犯康，乃至康区内部分争、部落冲突和冤家械斗，都或多或少印证了这个问题。

其次是贫与富的矛盾困扰不已，难以准确定位康区的财富地位。一方面，该区处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接带上，也处在藏、汉、彝、羌等多民族交汇的“民族走廊”上。千百年来，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交融互动，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财富，使康区成为藏区文明中心之一。而这里大量的自然人文资源，对外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除大量的地上宝藏，如森林、水能和其他动植物资源外，人们还发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多金属矿等地下矿藏。这些使康区成为近代争夺现实利益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川西北较为封闭，特别是康巴藏区的核心地带，直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力量介入前夕，基本上还处于半自由的部落与松散治理的“土头社会”并存状态，而“土头”之间和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各个地方势力也是相互割据纷争。区域间、族群间和部落间壁垒森严，交易成本高昂，加之落后而贫乏的公共设施建设，资源得不到开采，难以有效整合利用，使这一区域陷于效率低下、社会滞缓状态。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悖。而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主义制度与地方制度的对撞导致了经济、政治等重大变革后，地方文化和社会发育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与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齐头并进，这对矛盾依然纠结。

再次是形式上的政教分离与事实上的政教结合。在全民信教的川西北，呈现出“双信仰”“多信仰”和“信仰游移”的奇观，为相关学科展示了与众不同的学术价值。自宋代淳祐年间，藏传佛教治理机制与“土头制度”，在川西北确立政教结合（或联合）的地方统治以来，经历了八个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它是一个相对的自由王国。公元13世纪，元朝完成了对吐蕃政权的统一，设立“释教总制院”，全面管理藏区的军政、民政和财政等事务后，为加强统治，元中央政府采取了“僧俗并用”和“军民通摄”的政策，确立了藏区政教合一的土司体制，事实上孕育了地方抗衡中央的政治怪胎。元帝国提高对藏区管理规格的原因，除了皇帝信仰藏传佛教外，还与当时中国西部局势有关。当时西部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元发祥于蒙古高原，坐拥中原和其他农耕文化区，这两大统治地带都已在掌握之中的前提下，对西部各族的统治在中央看来成为薄弱环节。元王朝牢牢抓住了占西部面积和人口比重很大的藏区，以稳定西部。明、清、民国历代统治者和中央政府因袭传统，形成了目前藏区的基本

格局。政教结合（或联合）作为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治下的怪胎，在川西北得体地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再次大规模进入之后才告“退位”（第一次几乎是全军进入，那时叫红军）。根深蒂固的政教结合（或联合）制度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非正式制度，并没有终结它的统治影响。它从形式上的“退位”与事实上的“在位”引发了学界的浓厚兴趣，为相关学科建构新课题提供了机会。

此外，川西北文化现象的独特与文化形态的兼容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这里不仅仅因为它的大部分区域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也不仅仅因为它独特的自然环境及其独特的历史和区位，更在于这背后独特的制度文化背景。为了使研究更加规范化，有人认为从学理上应该建立“康巴学”。这种颇具积极意义的动议，虽在建立一门新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实验路径方面烟波迷茫，却表明了学界给予涉康问题的科学关怀。

二

上述特性，自然增加了川西北问题的研究价值。作为一种学术关怀，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到了一个高峰。若非 20 世纪早些时候的边疆危机时代来临，或许对川西北问题关注的程度还要大打折扣。抗战的爆发，导致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移向西南。在外族的提醒下（也包括英法等国从西藏“捣鼓”过来，怂恿噶厦，觊觎江东，攻城略地），使得川西北问题升温很快。各界把注意力投向西康。当时的西康，“东邻四川，北接青海，西连西藏，南界印度、缅甸与云南。合计面积约五十三万五千平方公里”^①。这么大的地方，对于大半国土已经沦于敌手、而且内部割据纷争迭起的中国而言，自然非同寻常。研究康区，既是为了国家、民族生存，也是为了张扬真理和学术精神（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也不排除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现实需要使然）。

为满足这一新形势，1938 年，主政康区的刘文辉（字自乾）先生创办《康导月刊》，开辟了研讨康区问题的领地，自此该刊持续 10 年，发行六十余期。刘文辉对于研究康区问题给予了倾心倾力地支持。第一个受到资助的是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柯象峰教授（1900~1983）。1938 年暑期，他与徐益棠教授组织“西康社会调查团”，带领弟子们对西康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做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全面考察。这次西康之行，收获可观，包括不少文物标本、照片等珍

^① 刘文辉：《刘自乾先生建设新西康十讲》，建康书局 1943 版第 25 页。

贵资料。对于西康的感悟心得，在柯象峰的《西康纪行》中做了洋洋洒洒的表述。事实证明，他们是经受了研究康区实证问题的最基本的考验。

如果说仅仅是一个大学的学者进入还不足以证明康区问题升格的话，那么这期间有一批人的进入就令人感到康区问题非同一般了。继柯象峰之后，蒋介石的“智囊”和理论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1891~1949）一行从成都出发前往甘孜考察。他身兼两任：一是祭奠九世班禅，二是观察刘文辉治下的康区动静，以便谋划建立西南抗战后方。事实证明，他基本上不能接受康区气候。几乎同时，黄国璋（1896~1966）和邵逸周（1899~1975）率数十人赴川康，对康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收获颇丰。还有吴文晖与伍启元教授带领国立中央大学科学考察团的梁甄第、陈如先、刘智德、徐麟、薛德基、齐兆武等人对康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1939年3月，近现代史上两位“叫得响”的人物李璜和黄炎培率“川康建设视察团”，对川康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著有丰厚可观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这期间，以曾昭抡（1899~1967）带领20人组成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对西康进行综合科学考察，著有《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书》。同时，教育部组织大规模的川康科学考察团，金陵大学教授孙明经（1911~1992）在此次考察中，全程拍摄大量珍贵照片和电影（据孙健三先生称，幸存的还有“三麻袋”）。在此期间，他在色须草原一带巧遇有“康巴眼睛”之称的庄学本（1909~1984）。庄先生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以宁、康为主做了实地考察，在此间，他给刘文辉拍了著名的、很具西康风情的“全家福”。同时，时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的冯汉骥（1898~1977）也前往康区，据说积有“稿十余筐”的成果，惜未发表。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更加值得人们注意的红军活动、西康变乱、康藏之争，以及其他大量的军政宗教活动。这些活动或者制造问题，或者发现问题，增加了康区问题的分量。

特定的区位条件，给研究川西北问题带来很大的影响。研究川西北问题，可以分为藏语系（经院体系）和汉语系（世俗体系）两大系统。藏语系紧贴佛经而行，飘逸艰深，非一般人力所能及，面世成果为人所知甚少，故大多数人心向往之而力所不能及。从汉语系方面看，研究川西北藏区问题，从20世纪初至今，绵延持续，历经百年，已有了一定积累。就研究资料来源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过去的成文资料为主的成果（姑且称之为“训诂派”），另一类是以自身现实调查依据为主的成果（姑且称之为“实证派”）。训诂的功

夫，似乎非要精透到溯及文化源头而不足以为信的地步，这不可避免要精通汉文以外的各种资料，包括藏传佛教原文典籍，但是做这样的工作绝非短时所能奏效。所以，在这条路上，非兼跨多种文化的方家大德而不能有所建树。而实证的功夫又为艰苦的自然环境所困扰。诸如南路的理塘寺和北路的德格印经院这类“有看头”的景观，多为海拔 4000 乃至 5000 米以上的高原或高山所困，一般久居象牙塔的高人难以涉足。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究竟是走哪条路子更好？当然，这并非造成川西北问题不可问津的唯一原因，也并非就能阻挡研究川西北的道路。一些前辈如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人，锲而不舍，日进有功；一些人本身就是当地人，如格桑群觉（刘家驹）等，还有很多前辈，这里一时难以穷尽，他们曾经在 20 世纪早些时候共同掀起过实证研究高峰，对康区或康藏问题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川西北需要虚心向他们讨教取经。

三

当一个高峰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过，另一轮高峰又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至。20 世纪 50 年代可以看作是新时代到来后研究新问题的又一个高峰。正如本书中叙述的那样，这个时期的主题是执政党研究如何对地方实施治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和理论方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很多人都做了范围、视角和深度不同的调查，但是使用的方法都是阶级分析法，结论都是先进社会制度必须取代落后社会制度。基于这个背景，大量研究指向的目标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实施“民主改革”，“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落后的政教结合的地方制度”。这一时期研究川西北问题的代表人物有杨静仁、李子杰、邓锐龄、杨辛、张正明等。

从后面的情况看，这些研究的成果转化率是很高的，他们很多对策建议被政权机构采纳，那就是民主改革的迅猛推行，用新的正式制度取代了旧的地方制度。但是当新的正式制度在这些地方确立之后，情况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如人民公社体制，并没有结束游牧经济，也没有根绝寺庙经济；即使改革开放后也没有使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和发展，而无意插柳的寺庙经济却得到了充分发展。有人感到，川西北发展不快之源似乎是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所致，于是曾经修建了大量定居点，建立很多网围栏，送文化和医疗卫生“下乡”，试图解决文化和社会服务的均等问题，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进展总是艰难。人们不禁问道，这究竟是不是靠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能解决的问题？学

界看到，事实上，当地居民在追求“彼岸幸福”的方向，与正式制度推行“现世小康”的目标相悖，这可以看作是继制度变革后的又一次对撞。既然是对撞，是由两种力量的矛盾引发的碰撞，不论哪方撞“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和谐发展。而在世界一体化追求“包容”目标的进程中，需要的不是对撞，而是对越。《诗》云，对越者，配称，犹言对扬。本书认为，两种迥异的制度尽管在有限时空内展现出“对撞”图景，但就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而言仍显交融互动的秩序与进阶。故在两种制度由“对撞”而“对越”进程中，是一个渐进的嬗变，而非跃进的突变。这点似乎是本书分析中呼之欲出的一个命题。

本书灵魂在于：两种迥异制度和谐发展的根本在于文明的“对越”而非强力的“对撞”，并试图在制度“对越”之间找到根本的路径——农业产业发展的制度融合与分工合作。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前半部分论述了制度“对撞”根源和遗留的问题，后半部分论述了制度“对越”的理论依据与实现路径。这样，试图解决“制度相融”问题，为建构一个新研究视角拓展新的思想空间。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我的合作导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社会学家刘世定教授给予了高屋建瓴的指点；《新华文摘》前总编辑刘元彦老先生在耄耋之年还不忘激励后学，慷慨题写书名；四川民族出版社相关领导和朋友给予出版方面的真诚相助；我的家人、朋友、同学为此作出了默默奉献。鉴于此，本书的出版，应该看成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的结晶。

对他们的付出致以衷心感谢！

丰 禾

壬辰春于北大中关村新园

目录

CoNTeNTS



制度扩散中的政治推行与差异性（代序）	1
前 言	5

上编 制度交替——甘孜藏区民主改革

引 言	3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甘孜藏区	5
一、新中国成立前甘孜藏区的基本状况	5
二、内部的差异性	12
三、新政权西康省西藏自治区的“开步走”	15
第二章 实行民主改革	18
一、执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改革的理论	18
二、中国特色的民族地区改革理论	20
三、毛泽东的意图	22
四、改革的意见分歧	24
第三章 民主改革面临的风险	28
一、调查研究	28
二、出台的指导性文件	30
三、地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决定启动改革	30
第四章 改革试点与推广	34
一、“美人谷”的试点	34
二、“美人谷”试点发现的问题	36

三、改革推广中不可克服的麻烦	38
四、中共康定地委第七次扩大会议	46
第五章 叛乱的爆发	48
一、叛乱爆发的直接原因	48
二、毛泽东给叛乱定性	51
三、政府平息叛乱	53
四、叛乱对周边产生的影响	55
五、中央的决心	57
第六章 民主改革在平息叛乱中推进	59
一、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的方针	59
二、区域民主改革进程与全区民主改革结束	64
三、留下的思考	68

下编 制度分析——川西北经济社会变迁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73
一、问题的提出	73
二、相关概念界定	76
三、研究进展	80
第二章 川西北农业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86
一、川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86
二、川西北农业发展的优势	96
三、川西北农业发展存在的劣势	99
四、川西北农业发展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102
五、川西北农业发展面临的威胁	104
六、川西北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106
七、小结	107
第三章 川西北农业产业发展的制度分析	110
一、川西北农业及制度的变迁	110
二、新时期川西北农业发展的主要制度	112
三、川西北农业现行正式制度基本框架的建构及实施	114

第四章 川西北非正式制度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120
一、非正式制度的意义	121
二、强相互作用下藏区文化与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121
三、藏族宗教文化对农业的诠释	122
四、藏传佛教对农牧区及农业生产的影响深刻	123
五、川西北宗教渊源深厚	126
六、藏文化对农业和相关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127
七、藏文化与农业正式制度的兼容	128
八、传统习俗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129
九、非正式制度主导下的农业经济实体——寺庙经济	131
十、寺庙经济参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136
十一、小结	142
第五章 川西北农业及其主导产业发展	143
一、农业在区域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143
二、川西北农业内部各主导产业发展	149
三、发展高原特色农业	152
四、小结	157
第六章 川西北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158
一、新村定居建设带动农业产业发展	158
二、加工业带动农业产业发展	163
三、特色农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模式——以亚丁旅游区为例	174
四、小结	179
第七章 结论与路径选择	181
一、结论	181
二、路径选择	182
参考文献	185



上编

制度交替

——
甘孜藏区民主改革